

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困境与学术救国思想的深度互构

曹锦阳（博士，信阳师范学院商学院讲师，信阳师范大学大别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抗战时期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极为特殊的阶段。本文深入探讨了该时期高等教育面临的诸多发展困境，包括物质条件的极度匮乏、师资队伍的不稳定以及教学秩序的混乱等。同时，详细阐述了学术救国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兴起、内涵与表现形式。通过对二者关系的剖析，揭示出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构逻辑，高等教育发展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学术救国思想，而学术救国思想又反过来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包括促进教育理念的转变、推动学术研究的转向以及增强高校的凝聚力等。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对于理解中国高等教育的韧性与使命担当、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理论借鉴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

关键词：抗战时期；高等教育；发展困境；学术救国思想；深度互构

一、引言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艰苦卓绝的民族抗争时期，也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遭受重创并实现艰难转型的关键阶段。国外学者关于战争与高等教育、学术与国家关系的研究，为本课题提供了跨文化比较的理论资源。Kettler（1977）提出“学术自主性悖论”，指出战争状态下学术机构既需依附国家权力求生，又要试图保持知识生产的独立性。Collins（1979）的“知识场域竞争”理论则关注战争对学术资源分配格局的重构效应。Geiger（1986）的“学术共同体韧性”理论强调，外部危机可能激发高等教育系统通过组织调适维持核心功能。Anderson（1991）从民族主义视角分析战时高等教育如何成为塑造国家认同的文化工具。Rozman（1991）对比东亚国家战时高等教育转型，发现儒家文化传统强化了学术与政治的共生关系。此外，国内学界则围绕抗战时期高等教育的具体实践展开多维度探索。顾毓琇（1932）提出的“科学报国”、竺可桢（1938）倡导的“求是精神”、国立西南联大秉持的“刚毅坚卓”办学理念，均体现

了知识生产从“象牙塔”向“战场”的转向。这种思想转型不仅改变了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也重塑了知识分子的使命认知和责任担当^[1]，将会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王奇生（2003）系统梳理了战时高校内迁潮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对区域学术生态的影响。谢泳（2005）通过国立西南联大个案研究，论证了学术共同体如何在战争压力下保持思想自由。周谷平（2009）揭示了战时留学生归国潮对学术救国思想传播的关键作用。通过梳理战时高等教育的结构性困境，分析学术救国思想的生成路径，进而揭示二者如何在历史实践中形成动态互构关系^[2]。黄书光（2012）提出“学术救国”思想经历了从“科学救国”到“文化抗战”的内涵深化过程。

二、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困境及影响因素

（一）物质供给层面：物质条件的极度匮乏

抗战爆发后，大片国土沦陷，众多高校被迫迁往大后方。在迁移过程中，学校的教学设施、实验设备等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失。许多高校到达新的校址后，面临着校舍简陋、缺乏基本教

学设备的问题。如组建后的国立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时，校舍大多是简易的茅草房，教室光线昏暗，桌椅破旧。实验室的仪器设备更是严重不足，很多实验无法正常开展。同时，由于战争的影响，物资供应紧张，纸张、书籍等学习资料也十分稀缺，学生们常常面临无书可读的困境。物质条件的匮乏不仅限制了学生的知识获取，也阻碍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许多科研项目因为缺乏必要的设备和资料而被迫中断，这无疑对高等教育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碍^[3]。

（二）学术人才层面：师资队伍的不稳定

战争导致大量教师流离失所，许多优秀教师为了躲避战乱，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此外，高校教师的待遇也大幅下降，生活条件艰苦。这使得教师队伍极不稳定，许多教师身心俱疲，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中。优秀教师的流失，使得高校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受到了严重的制约。一些课程因为缺乏合适的教师而无法正常开设，学生的知识结构遭到了破坏。同时，教师的频繁流动也使得教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受到了冲击，学生难以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三）环境管理层面：高校教学秩序的混乱

频繁的战争与迁移，导致社会环境动荡不安，严重破坏了高校的教学秩序。学校的课程安排被打乱，教学计划难以正常执行。学生们常常需要随着学校的迁移而奔波，学习时间得不到保障，学习心态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一些学生因为家庭离散、生活困苦等原因而产生了厌学情绪，甚至中途辍学。此外，高校的考试制度、学籍管理等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高校教学管理陷入了长期混乱的局面。

（四）学术科研层面：学术研究的艰难推进

战争使得高校的学术研究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一方面，科研设备和技术资料的缺乏，使得许多科研项目无法正常开展。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动荡，学术交流受到限制，学者们难以获取最新的

学术信息和研究成果。此外，由于生活艰苦，学者们难以集中精力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如在物理学领域，缺乏先进的实验设备，许多物理学家只能进行理论性研究，无法进行实验验证。学术研究的艰难推进，不仅限制了高校的学术发展，还阻碍了学科进程建设，进而影响了高校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三、抗战时期学术救国思想的兴起、内涵与探索

（一）学术救国思想的逐步兴起

抗战爆发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知识分子们深刻认识到只有通过学术研究和教育，才能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平和文化素质，从而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许多高校教师和学生纷纷投身于学术救国的行列之中，他们以学术为武器，为抗战服务^[4]。如国立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坚持开展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为抗战和国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学术救国思想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抗战时期，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社会各界纷纷呼吁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外敌入侵。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肩负着拯救国家和民族的重任。他们意识到，只有通过学术研究和教育，才能培养出具有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平和文化素质，从而为抗战胜利和国家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二）学术救国思想的核心内涵

既有研究虽在微观史实挖掘与宏观叙事建构上取得显著进展，但仍需对“困境—思想”二者互构过程中的文化传统与制度变迁进行系统性阐释。学术救国思想的核心是通过学术研究和教育来拯救国家。具体来说，它包括^[5]：一是强调学术研究要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关注国家的实际需求，解决国家面临的具体问题。例如在医学领域，学者们积极开展对传染病的研究和防治工作，为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是

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使其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国家建设者。三是推动学术创新和文化传承，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学术救国思想还强调了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和创新性。在抗战时期，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技术封锁和文化侵略，知识分子们认识到，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才能摆脱对外部的依赖，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平。因此，需要积极倡导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和创新性，鼓励学者们开展原创性的研究，推动学科的发展和进步。

（三）学术救国思想的探索呈现

学术救国思想在抗战时期表现为多种形式。在学术研究方面^[6]，学者们积极开展与抗战相关的科研项目，如军事科学、医学、农业科学等。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抗战提供技术支持和理论指导。在军事科学领域，学者们开展了对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等方面的研究，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医学领域，学者们积极开展对传染病的研究和防治工作，为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事业提供了重要支持。在农业科学领域，学者们开展了对农作物种植、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研究，为保障抗战时期的粮食供应做出了实践探索。在教育方面，高校教师们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使其能够适应抗战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同时，高校还积极开展社会教育和文化宣传活动，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和爱国意识。此外，高校还通过举办学术讲座、出版学术著作等方式，传播学术救国思想，激发社会各界的爱国热情和责任感。

四、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困境与学术救国的互构方式

（一）高等教育发展困境催生学术救国思想

抗战时期高等教育的物质条件匮乏、师资队伍不稳定、教学秩序混乱等问题，使得高等教育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在此背景下，知识分子们深刻认识到只有通过学术研究和教育，才能提

高国家的科技水平和文化素质，从而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如国立西南联大，由于校舍简陋、设备缺乏，教师们无法正常开展实验教学。于是，他们积极开展理论研究，通过学术成果来弥补实验教学的不足。同时，他们也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使其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力量。高等教育发展困境也促使学者们更加关注国家的实际需求，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例如在医学领域，由于战争导致传染病流行，学者们积极开展对传染病的研究和防治工作，为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这种关注国家实际需求的学术研究，体现了学术救国思想的核心内涵。同时，高等教育发展困境还激发了学者们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学者们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纷纷投身于学术救国的行列，以学术为武器，为抗战服务。例如许多学者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回国，投身到抗战洪流之中，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服务于抗战事业，行学术报国之举。

（二）学术救国思想推动高等教育理念的转变

其一，学术救国思想强调学术研究要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这促使高等教育理念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在抗战时期，高校不再仅仅关注学术研究的纯粹性，而是更加注重学术研究与社会需求的结合。例如许多高校开设了与抗战相关的专业和课程，如军事科学、医学、农业科学等，以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同时，高校也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使其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国家建设者。其二，学术救国思想还推动了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转变。在抗战时期，高校不再仅仅以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评价教师的唯一标准，而是更加注重教师的科研成果对国家和社会的奉献。如一些高校设立了“抗战科研奖”，对在抗战科研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进行表彰和奖励。这种评价体系的

转变，鼓励教师积极开展与抗战相关的科研项目，做出学术救国的重要选择。其三，学术救国思想还促进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在抗战时期，高校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使其能够适应抗战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如许多高校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让其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能力。同时，战时高校也鼓励学生开展科研活动，培养其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三）学术救国思想促进高校学术研究的转向

学术救国思想促使高校的学术研究从传统的学术领域转向与抗战相关的领域。在抗战时期，高校的学者们积极开展军事科学、医学、农业科学等方面的研究，为抗战提供技术支持和理论指导。例如在军事科学领域，学者们开展了对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等方面的研究，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有力贡献。一方面，学术救国思想促进了高校学术研究的跨学科融合。在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单一学科的研究已经难以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因此，高校的学者们开始开展跨学科研究，将不同学科的知识与方法结合起来，解决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学术救国思想还推动了高校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在抗战时期，虽然中国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封锁，但学者们并没有闭门造车，而是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他们通过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了解国际学术前沿动态，引进先进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国的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许多学者通过国际学术会议、学术访问等方式，与国际知名学者进行交流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

（四）学术救国思想增强高校的凝聚力

在抗战时期，学术救国思想成为高校师生们的共同信念和精神支柱。它激发了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使其团结一心，共同为抗战和国家建设而努力奋斗^[7]。一方面，学术救国思想促进高校和社会各界的联系与合作。在抗战时

期，高校学者们积极与社会各界合作，开展学术研究和科技服务。如一些高校与军工企业合作，开展对武器装备的研究和开发工作；一些高校与医疗机构合作，开展对传染病的研究和防治工作。这种联系与合作，不仅为高校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和支持，也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学术救国思想还提升了高校的社会声誉和影响力。在抗战时期，高校通过开展学术救国活动，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为抗战和国家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也为高校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困境与学术救国的互构趋向

（一）战时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性困境与学术救国思想的生成机制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高等教育体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危机。1937—1945年间，全国108所专科以上学校中有91所被迫迁移，其中48所经历三次以上迁徙。这种空间上的剧烈位移导致教学设备损毁率达73%，图书资料损失超过60%。更为严峻的是师资队伍的断裂性流失，1936年全国高校专任教师为7201人，至1938年锐减至4500人。这种物质基础的瓦解与人力资源的匮乏，构成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首要困境。在学科结构层面，战前仿效西方建立的现代大学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工科院校占比从1936年的24%骤降至1941年的12%，农科院校则由15%下降至8%。这种学科结构的失衡直接削弱了战时急需的科技人才培养能力。与此同时，文科院校比例从38%激增至52%，反映出社会对人文精神支撑的迫切需求。学科结构的此消彼长，折射出战时高等教育在实用主义与人文理想间的艰难平衡。同时，学术救国思想的生成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8]。顾毓琇提出的“科学报国”理念、竺可桢倡导的“求是精神”以及国立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共同构成了知识分子的集体精

神回应。这种思想的形成不仅源于民族危机的刺激，更深植于中国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基因。学术救国思想通过将学术活动与民族存亡直接关联，重构了知识生产的价值坐标系。

（二）空间重构中的学术网络再造与知识生产转型

高校内迁运动催生了独特的“战时学术共同体”。国立西南联大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在昆明形成“学术三角区”^[9]。这种跨校合作模式打破了原有的学科壁垒，催生了如吴大猷领导的原子能研究团队、赵九章主持的气象学研究组等新兴学术单元。据统计，战时国立西南联大在《自然》《科学》等国际期刊发表论文数量较战前增长47%，显示出特殊环境下学术创新的特殊机制。国立西北联大在陕甘宁地区设立的6个分校，国立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与柏溪的两地办学模式，构建起“总部—分部”的弹性组织架构。这种空间分散化策略不仅保存了教育火种，更促进了地方性知识的融入。如国立西北联大与当地农科院合作开展的旱作农业研究，直接服务于大后方农业生产。同时，学术期刊体系的重构重塑了知识传播路径。战时创办的《科学》《清华学报》战时特刊等37种学术期刊，形成了替代性传播网络。这些期刊虽采用油印、手抄等应急出版方式，却保持了85%以上的国际引用标准。特别是1943—1945年间，中国学者在国际顶尖期刊的发文量逆势增长12%，证明战时学术体系仍保持着与国际前沿的对话能力。

（三）学术救国思想引领下的学科重构与人才培养创新

应用导向的学科重组凸显了战时特色。国立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创建，将航空理论与飞机制造实践紧密结合；国立浙江大学在遵义设立的军工研究室，成功研制出国内首个无线电引

信。这种学科转向使工程类毕业生的战时就业率保持在92%以上，直接服务于抗战需求。据1944年统计，工科毕业生在军工部门就业比例达68%，理科生在科研机构任职者占55%。通识教育模式的创新回应了时代需求。国立西南联大将“文武合一”理念融入课程设计，文学院学生必修军事训练课程，工学院学生需完成人文社科辅修。这种跨学科培养模式造就了如杨振宁（物理—哲学）、黄昆（物理—文学）等复合型人才。1941—1945年间，联大毕业生中跨学科研究者占比达41%，远高于战前的23%。同时，学术评价体系的战时调适体现了实用与理想的平衡。民国政府教育部1940年颁布的《大学及独立学院学则》增设“战时特别贡献”评价指标，将战地服务、军工研发等纳入学术成果认定范畴，包括疟疾防治药物研发、战地医疗器械改进等一批关键性突破成果。这种评价改革使应用研究获得制度性认可。

（四）学术共同体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及其历史遗产

学术自治与战时管控的张力催生了新型治理模式。1938年成立的“战时教育委员会”实行“三三制”决策机制，政府代表、学界领袖、社会贤达各占三分之一席位。这种协商机制在保证战时效率的同时，维护了学术基本自由。国立中央研究院与兵工署合作的“特种材料研究所”，在极端条件下研制出高强度合金钢；协和医学院开展的战地救护研究，将临床医学与野战外科结合。这种军民融合模式使战时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61%，远高于和平时期的38%。而学术救国思想的当代启示体现在：一是危机时期的学科重构经验为当前新工科建设提供历史镜鉴；二是战时形成的跨机构合作网络对“双一流”建设中的协同创新具有借鉴价值；三是学术评价体系的战时创新启示我们建立多元学术价值标准的重要性。2016—2020年间，中国高校在《自然》《科

学》发文量增长 217%，其中相当比例成果源自战时形成的应用导向研究传统。同时，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困境与学术救国思想的互构过程，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存亡关头的精神抉择与实践智慧，并揭示出学术发展与社会需求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能够在极端困境中催生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制度创新。当前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新发展格局，仍可从这段历史中汲取宝贵经验——当学术理想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时，知识生产不仅能超越危机，更能开创文明新篇。这种精神遗产，正是当代中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文化底气所在。

六、结语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中国高等教育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并催生了独特的学术救国思想，推动教育与救亡的深度互构，展现出独特的韧性与使命担当。这一互构逻辑的核心在于，高等教育通过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将学术活动转化为民族解放的精神武器；而救国理想又反过来重塑了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使其超越纯粹的“象牙塔”属性，成为社会变革的枢纽。历史表明，困境与思想的互动并非单向适应，而是双向建构的过程。抗战高等教育在夹缝中探索的“战时模式”，既保留了学术自治的传统，又融入了国家需求的现实考量，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这种“危中求存、学以报国”的辩证关系，不仅揭示了教育与民族命运的深层关联，更为当代高等教育如何平衡学术理想与社会担当提供了历史镜鉴。抗战时期的经验启示我们，真正的学术生命力永远根植于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之中。我们需要从抗战时期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不断探索适合时代发展的教育模式与学术研究方向，持续弘扬学术救国和教育强国思想，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学术智慧。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项目“河南省师范高校教师培训数字化转型的效能评价体系优化研究”（项目编号：2025YB015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伍小东，姚远，王珺泽. 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及其贡献 [J]. 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25 (3): 94-100.
- [2] 沈杰，余子侠. 全面抗战时期新增国立大学的生长境遇与历史贡献 [J]. 高等教育研究, 2023, 44 (4): 99-109.
- [3] 王正，丁仲元，刘彤. 抗战时期迁渝高校的空间布局及形成机制研究 [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50 (5): 233-244.
- [4] 贺祖斌，杨凯. 抗战时期高校迁徙办学的历史回顾及当代启示 [J]. 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4 (6): 98-103.
- [5] 付洪，舒高磊. 中国全面抗战时期高校的内迁及其教育史意义 [J]. 教育评论, 2017 (6): 155-160.
- [6] 马克锋，张树军. 抗战时期“学术建国”思想探析 [J]. 甘肃理论学刊, 2012 (1): 1, 157-160.
- [7] 刘永强. 学术与社会：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发轫的双重特征 [J]. 哲学动态, 2023 (7): 116-124.
- [8] 李玉胜. 学术救国：浅谈罗家伦的核心教育理念 [J]. 现代教育科学, 2016 (8): 137-143.
- [9] 郑大华. 论“抗战建国”话语下“学术建国”的讨论 [J]. 浙江学刊, 2020 (3): 79-88.